

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实证研究

王艺燕,朱 洵,孙 毅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 要: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我国267个城市开展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实证研究。城市经济、人口、社会和公共管理是影响中职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业升级对中职规模发展需求提出挑战;人口基数与人口转移对中职规模发展具有双重推动作用;公共品投入中教育偏好增强有利于中职规模发展;失业问题引发就业技能培训需求增大,推动中职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城市类型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增长点,并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共性和差异性两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教育规模;城市发展;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0)0021-0090-07

一、引言

中等职业教育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初、中级技能型人才的重任。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生存危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的现象突出^[1]。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经历了增长、下降、再增长、再下降4个发展阶段,规模波动幅度较大并呈现出缩减的趋势^[2]。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应如何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其观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观点,欧阳河指出当前我国职普比的设定缺乏科学依据,应借鉴国

际经验,结合我国重普教的文化传统、职教发展现状和未来脑力劳动需求显著增加的趋势,未来职教的重心应该在高职,中职不必再固守职普比大体相当^[3]。第二类观点,石伟平提出我国产业结构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中小企业对初、中级技能人才需求规模仍旧较大,工业4.0时代并非所有岗位对人才都有较高的技术技能要求,工业4.0时代仍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倘若抓住发展机遇,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大有可为^[4]。姜大源认为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合理的劳动力结构的诉求,是人本的教育公平性的追求^[5]。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应更进一步聚焦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背景决定了中等职业

收稿日期 2020-04-24

作者简介:王艺燕(1995—),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统计及教育心理学;朱洵(1978—),男,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孙毅(1992—),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规模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应因地制宜、精准发展。我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与教育的发展差异较大,未来的普职比政策应更具区域或阶段灵活性^[6]。中等职业教育鲜明的地方性和行业性特征决定了其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前研究鲜有基于城市发展视角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进行讨论,还未能考虑到城市发展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关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布局规划。推动职业教育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互惠双赢^[7]。本文基于我国267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城市发展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优化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布局。

二、研究设计

(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概念界定

教育规模是指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其所拥有的人、财、物数量的总和。从中等职业教育内部活动结构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教师和学生规模、教育投资规模及教育设备规模。学界对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规模较为关注,并成为衡量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代表性变量。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设定依据大致存在两种逻辑起点。一是职普比论。部分研究遵循教育系统内部的规模设定逻辑,通过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不同类型教育的学生人数对比,衡量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减。二是社会系统论。较多研究更加关注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供给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设定逻辑。本文遵循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设定的社会系统论观点,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城市产业、人口、就业等社会系统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

(二)城市发展的操作性定义

城市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经济、人口、社会和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具体可以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表现,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引发城市失业增加、

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问题。有学者指出,城市虽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就业压力也随之加大^[8]。从城市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加^[9]。城市公共品是指在城市范围内主要以城市政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市民共同享用并具有一般公共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产品^[10]。由于城市公共问题的多样性和政府预算约束,政府对城市公共品的投入存在偏好行为,偏好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对价值的排序,不同商品价值之间是互斥的,即政府需要对其所承担的各项公共事务做出轻重缓急的次序安排。综上所述,本文将采用城市产业升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公共品投入的政府偏好和城市失业问题对城市发展进行操作性定义。

(三)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经验假设

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经济发展先行并驱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从现有研究结论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规模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程度^[11]。城市产业升级通过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传导机制,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关系不大^[12]。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产业升级匹配度偏低,其匹配度分别为0.153、0.146和0.160^[13]。生产技术复杂程度提升带动城市产业升级,从而对劳动力市场的中等职业教育就业规模提出新的需求,正如庄西真依据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理论提出的观点,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正处于以商品加工出口为主的阶段,需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而我国城市也必然会走向产业规模壮大和产业价值链高移的阶段,需促进中高职协调发展^[14]。

城市人口规模决定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生源基础,简而言之,城市人口已成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蓄水池”。有研究基于广州市2018—2035年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分析,预测得出广州市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将稳步上升,2034年在校人数将达到峰值^[15]。有研究也同样认为,从河

北省各市来看,虽然秦皇岛市和保定市同处于“一线”区域,但保定市人口是秦皇岛市人口的3倍,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远高于秦皇岛市^[16]。从当前我国城市人口发展的来源来看,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一部分来源于城市人口基数作用,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城市转移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提供了生源基础。

城市公共品投入偏好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国内有研究通过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市的教育投入偏好问题^[17]。城市对于教育投入的偏好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支出中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减。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城市准公共品的性质并极度依赖地方财政支持,有研究通过灰色关联法计算得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对公共财政支出的依赖程度较高^[18],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发展需要财政性经费中基础建设和教育事业费作为基本物质保障。

城市失业问题引发就业技能培养需求,从而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将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的1 000亿元用于1 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有研究通过对厦门市调查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比普通高中失业者少4.4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普通高中的3.29倍^[19]。应对企业工人转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问题,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基于上述文献的回顾和已有观点的支持,本文对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整理,形成要素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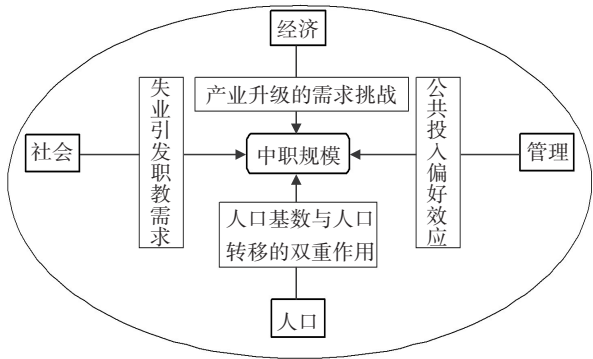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要素框架

架如图1所示。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经验假设:H1:城市经济发展中产业升级向中职规模发展需求提出挑战;H2:城市人口基数与人口转移对中职规模发展具有双重推动作用;H3:城市公共品投入中教育偏好增强有利于中职规模发展;H4:城市失业问题引发就业技能培训需求增大,推动中职规模发展。

三、数据与模型检验

(一)数据说明

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12—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包含选择的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由于统计数据缺失,西藏数据暂不计入统计分析中。在指标选取上,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指标主要有在校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考虑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反映了中职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在校生数反映中职的存量,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中职规模^[20]。对此,中等职业教育规模(SVES)以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进行测量。城市产业升级(IU)以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测量。城市人口规模(PS)以城市年均人口数量进行测量。城市公共品投入的教育偏好(EP)以城市教育投入占公共支出的比例进行测量。城市失业问题(UR)通过城市失业率进行反映。考虑到不同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SVES_{it}=a_1IU_{it}+a_2PS_{it}+a_3EP_{it}+a_4UR_{it}+\mu_{it}+\varepsilon_{it}$$

SVES_{it}表示第i个城市t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IU_{it}表示第i个城市t年产业升级状况;PS_{it}表示第i个城市t年人口规模情况;EP_{it}表示第i个城市t年公共财政投入中对于教育投入偏好情况;UR_{it}表示第i个城市t年失业情况; μ_{it} 表示为固定各类高校个体差异后的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UR为城市失业率,反映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状况。

(二)模型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见表1。考虑到序列在同阶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采用Pedrnoi检验和Kao检验进行协整关系判定。Pedrnoi指出Panel ADF和Group ADF

表1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Fisher 检验	PP-Fisher 检验	平稳性
SVES	594.75**	762.53***	是
D(SVES)	1 024.38***	1 335.43***	是
IU	113.34	150.25	否
D(IU)	840.73***	1 197.45***	是
PS	551.77	747.83***	否
D(PS)	827.73***	1 025.35***	是
EP	760.45***	949.15***	是
D(EP)	1 016.91***	1 376.28***	是
UR	628.23***	770.11***	是
D(UR)	1 144.07***	1 470.27***	是

注: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检验标准,下同。

表2 协整关系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称	统计量值
Pedrnoi 检验 (同质面板)	Panel v-Statistic	-8.882 353
	Panel rho-Statistic	14.657 6
	Panel PP-Statistic	-32.148 98***
	Panel ADF-Statistic	-3.236 058***
Pedrnoi 检验 (异质面板)	Group rho-Statistic	21.990 35
	Group PP-Statistic	-56.674 01***
	Group ADF-Statistic	-25.591 5***
Kao 检验		-3.412 763***

检验的效力最高,Kao 检验也能提供佐证。Panel ADF 和 Group ADF 的统计量结果显示拒绝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见表2。

面板数据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成,进而采取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变量间关系进行估计,见表3。混合回归模型未考虑地区异质性,D-W 值为0.227 6,表明存在自相关或空间相关问题。为此,进一步将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估计结果进行约束F 检验,

表3 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全模型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IU	0.009 1*** (6.361 7)	-0.033 4*** (-19.243 9)	-0.023 6*** (-15.456 4)
PS	1.072 2*** (54.712 4)	0.579 7*** (3.347 0)	1.109 4*** (27.836 6)
EP	0.017 8*** (5.215 058)	0.011 0*** (3.532 8)	0.012 2*** (4.172 2)
UR	0.145 1*** (5.870 0)	0.037 0** (2.103 5)	0.060 6*** (3.552 0)
C	3.459 9*** (28.494 5)	8.150 6*** (8.079 8)	4.626 8*** (19.584 0)
R ²	0.672 9	0.933 7	0.327 1
D-W	0.227 6	0.969 1	0.749 3
OBS	1 868	1 868	1 868

注:()中为T 统计量、OBS 为观测样本量,下同。

结果显示 $F=27.548\ 5>F(266)=1$,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更为合理。同时,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其目的是为了判定随机效应和固定效益模型的估计系数不存在明显差异,Hausman 值为 219.234,通过 1%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证明随机效应模型的误差项与各变量存在相关关系,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更为精准,其 R^2 为 0.933 7,拟合效果较好,D-W 值 0.969 1 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问题。

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全模型结果分析

我国城市产业升级向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提出了挑战,产业升级 1 个百分点,会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 0.034 个百分点。当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生产技术复杂程度提升带动产业升级,并通过人才需求的传导机制制约着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向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提出了新的需求。城市人口规模发展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提供潜在可能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 1 个百分点,将会带动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 0.579 7 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基数的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提供了生源基础。城市公共财政投入中教育偏好增强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城市教育投入增加 1 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会增长 0.011 个百分点。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中等教育规模的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城市失业率增加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提出了诉求,城市失业率增加 1 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会增长 0.037 个百分点。城市失业问题引发了职业教育就业技能培养需求,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问题更加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发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基础性作用。

(二)基于城市等级分类的模型结果分析

2018 年中国新一线城市研究所颁布《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通过专家对指标权重赋值和主成分分析赋权的方法,将我国城市等级分级为五类,其分类标准主要依据城市商业资源、城市人

口规模、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未来可塑性等五大指标权重赋值。本文将该标准作为城市分类标准,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城市类型中产业升级、人口规模、公共品投入和失业问题的差异。一线城市主要为北京市、上海市和南京市等;二线城市主要为厦门市,大连市和济南市等;三线城市主要为威海市、三亚市和吉林市;四线城市主要为周口市、宝鸡市和安阳市;五线城市主要为天水市、达州市和酒泉市等。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在不同等级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城市等级越高,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越大。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整体仍呈现出下降趋势,缩减力度最为强烈是三线城市,但是在二线和五线城市表现出减中有增的情况,如图2。

从全模型结果来看,已基本验证了城市发展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经验假设。然而,从不同等级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城市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值得深入探讨。对此,本文进一步基于不同等级的城市分类,观测

表4 基于城市等级分类的模型结果

变量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IU	-0.019 4*** (-3.308 6)	-0.019 9*** (-2.976 5)	-0.043 6*** (11.103 7)	-0.031 7*** (9.130 5)	-0.032 7*** (10.513 2)
PS	1.184 4** (2.305 5)	-0.464 5 (-0.725 1)	0.331 3 (-1.313 1)	0.218 5 (-0.569 3)	1.526 1*** (3.386 8)
EP	0.012 8 (-1.161 3)	0.024 6* (1.967 5)	-0.006 9 (-1.035 1)	0.008 8* (-1.917 9)	0.015 9*** (2.453 8)
UR	0.076 7 (-0.828 6)	-0.027 7 (-0.328 4)	0.023 4 (-0.998 6)	0.063 4* (-1.839 8)	0.050 8 (-0.971 2)
C	4.624 5 (-1.409 5)	14.758 1*** (3.775 8)	10.534 2*** (6.936 8)	10.082 0*** (4.472 6)	2.461 9 (-1.031 3)
R ²	0.932 8	0.780 5	0.864 1	0.878 6	0.895 4
D-W	1.585 4	2.022 8	1.087	0.939 4	0.932 5
OBS	133	196	455	532	553

城市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见表4。

(1)一线城市产业升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0.019 4个百分点,已通过1%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带动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1.184 4个百分点并且通过5%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一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与失业问题均不会引起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变化,其弹性系数均未能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2)二线城市产业升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0.019 9个百分点,并通过1%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二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增加1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会增长0.024 6个百分点,已通过10%的统计学检验。二线城市人口增长与失业问题并不会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变化造成影响,其弹性系数均未能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3)三线城市产业升级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负向作用最为明显,其弹性系数为-0.043 6,产业升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0.043 6个百分点,并且通过1%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三线城市人口增长、教育投入偏好和失业问题均不会引起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变化,其弹性系数均未能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4)四线城市产业升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0.031 7个百分点并通过1%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四线城市失业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会增加0.063 4个百分点,已通过10%的统计学检验。四线城市人口增长和教育投入偏好均不会引起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变化,其弹性系数均未能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5)五线城市产业升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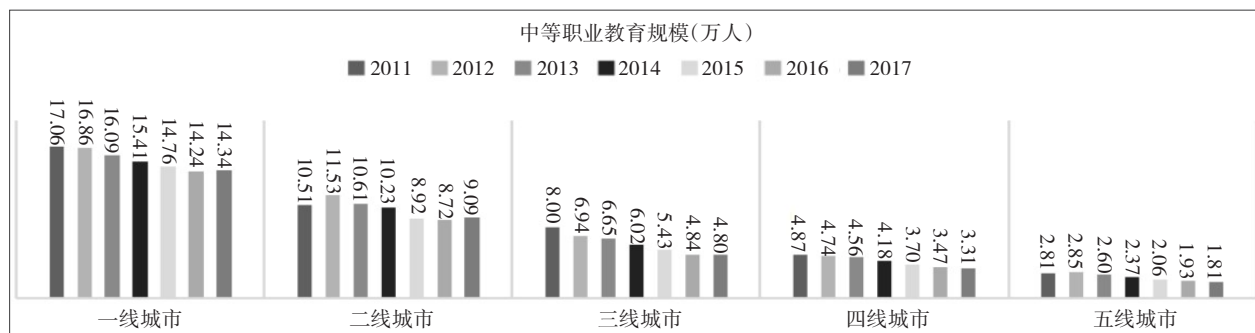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城市分类的中等职业教育平均规模变化

影响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缩减 0.032 7 个百分点,并通过 1% 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五线城市人口规模增长 1 个百分点,将会带动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 1.526 1 个百分点,并且通过 1% 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五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增加 1 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会增长 0.0315 9 个百分点,已通过 1% 的统计学检验。五线城市失业问题并不会引起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变化,其弹性系数未能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的讨论

基于上述结果的分析,本文将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分类成产业升级挑战型、人口增长推动型、教育投入偏好型和失业问题引发型。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变化的城市类型见表 5。

表 5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变化的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	产业升级 挑战型	人口增长 推动型	教育投入 偏好型	失业问题 引发型
一线城市	√	√		
二线城市	√		√	
三线城市	√			
四线城市	√		√	√
五线城市	√	√	√	

表 5 显示,一线至五线城市均属于产业升级挑战型城市,人口增长推动型城市有一线和五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型城市有二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四线城市属于失业问题引发型城市。

(1)一线至五线城市均属于产业升级挑战型城市,其城市产业升级均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提出挑战。基本呈现了随着城市等级降低,产业升级对其负向影响作用越强的趋势,并且不同等级城市的产业升级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效应。具体表现为,一线和二线城市产业升级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负向作用较弱;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产业升级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负向作用较强。当前我国城市产业升级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未能较好协调发展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以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阶段来看,2011—2017 年一线和二线城市第三产业年均占比均高于 50%,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第三产业年均占比均为 40% 左右。我国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产业升级的“阵痛期”效果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产业优

化与劳动力市场等要素不能较好匹配。中等职业教育急需调整专业招生和培养规模,从而更好地与城市产业升级相协调。

(2)一线和五线城市属于人口增长推动型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的生源动力主要来自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2017 年我国一线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为 935.47 万人,二线城市为 593.93 万人,三线城市为 558.63 万人,四线城市为 411.92 万人,五线城市为 238.30 万人。可以看出,我国一线城市具有人口规模优势,一线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主要得益于城市人口基数增长的推动作用,从而保障了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需求。五线城市并不具有人口规模优势,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依旧推动了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增长,其弹性系数比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拉动作用高出 0.317 9 个百分点。五线城市为主要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增长则更多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培训需求增加。

(3)教育投入偏好型城市为二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其教育投入偏好的增强能够较好地保障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2011—2017 年城市年均教育投入占公共支出的比例为 17.94%,一线城市仅为 15.76%,二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最强为 19.17%。二线城市较强的教育经费和物质保障调动了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积极性的同时也稳固了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四线和五线城市教育投入偏好的增强也能够较好地引起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四线和五线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基数较小,其年均教育占公共支出为 17.34%,接近全国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的物质基础。

(4)四线城市是失业问题引发型城市,其失业问题的发生会引发对中等技能培养需求,从而促使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并不会主要依靠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其城市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具有高强度专业性的结构性失业,中等职业教育还未能对其失业问题产生缓解作用。值得关注的是,五线城市也并没有发展成为失业问题引发型城市,结合我国五线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我国五线城市由于就业竞争压力较弱,从而不会向中等职业教育

提出强烈的培训需求。

五、建议

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需要解决好城市分类布局的共性问题。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城市产业升级未能较好协调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人工智能和工业4.0的时代,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需要依据劳动分工的变化调整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特别是针对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养社会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一线至五线城市中等职业教育均应积极主动应对城市产业升级的挑战,进一步强化产学关系,做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依据城市特色产业、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联合行业、企业和院校制订中等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规划、调整专业招生和培养规模。

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也需要解决好城市布局的差异性问题。结合城市发展的办学需求和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定位,城市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类型中具有显著的差异。应主张因地制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思路,四线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具有失业问题引发型的特点,四线城市应加大针对劳动力失业问题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规模;五线城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输入地,其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着力点应更贴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我国二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均表现出了较强的教育投入偏好,需进一步完善城市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更好地发挥二线、四线和五线城市教育投入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的促进效应,稳定中等职业教育生源规模。当前,我国三线城市对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需求并不强烈,其不具有人口增长推动型、教育投入偏好型和失业问题引发型的特点,可以考虑在三线城市逐步缩小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从而更好地优化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城市布局。

参考文献:

[1]郝天聪,石伟平.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下的职业教育研究——近年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分析[J].教育研究,2018(4):80-89.

[2][20] 谯欣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5(4):46-49.

[3]欧阳河.“普职比大体相当”缺乏科学依据,未来职教中心应放在高职[N].中国青年报,2016-12-02(7).

[4]石伟平,郝天聪.走向工业4.0还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吗?[N].光明日报,2017-04-06(14).

[5]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9):21-36.

[6]谢良才,和震.论现阶段的普职比波动[J].教育科学,2016,32(6):72-80.

[7]毛伟雄,陈金聪.职业教育与城市如何融合发展[N].光明日报,2018-04-05(7).

[8]何志扬.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调整[J].城市问题,2009(3):9-13.

[9]李成宇,史桂芬,杨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公共物品的引致需求分析[J].经济经纬,2016(4):8-13.

[10]李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经济性公共品[J].现代经济探讨,2019(3):71-78.

[11]韩宗礼.教育经济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43.

[12]姜大源.职业教育要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0.

[13]崔晓迪,翟希东,张晓凤.京津冀中职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7(2):27-32.

[14]庄西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性与阶段性[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0):3-9.

[15]查吉德,张传军.超大型城市中等职业教育生源预测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38-43.

[16]赵宝柱,曹晔,盛子强.中等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21):38-42.

[17]李煜伟,倪鹏飞,黄士力,等.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研究[J].教育研究,2012(4):29-34.

[18]苏荟,孙毅.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联的实证研究——以新疆南疆地区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4):36-42.

[19]魏立萍,肖利宏.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差异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8(1):40-44.